

《现代中国学的新范式——共同态度性的提倡》读后感

——中国学研究方法论中的经济因素分析——

方琢

读了加加美老师的论文收获很大,对中国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加加美老师提到“地域研究确立与其他学术领域不同的固有的方法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目前的地域研究确实没有固有的学术性的方法论”。而且他在对中国学研究方法论的总结中提到“中国研究以及其他一些地域研究具有很强的国策研究的趋向或是成为“国策研究”指向的研究领域。对此我认为中国学研究以及其他地域研究,在其形成过程中,除了意识形态以及无主体性外,方法论上还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干扰。这些经济因素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集中的表现为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世界体系,地域研究的方法论只能建立在这种体系的基础上,必然体现出西方中心和国策研究的特点。

对于经济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而言,在方法论上,依附理论就试图对之进行纠正。依附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作为结构性的全球主义思想,是解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理论,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指出:所谓依附,我们意指一种情景,在这种情景中,某些国家的经济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扩张所制约。在两个或多个经济之间的互赖,以及这些经济与世界贸易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如果某些国家(优势国)能够扩张而且自足,而其他国家(依附国)之扩张与自主反为优势国之扩张所反映,则这种关系

一旦建立，就呈现了依附的形式。依附论思想认为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条件受制并且从属于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的发展和扩张，处于支配地位的中心国家可以独立发展，而受支配的边缘国家只有附属前者才能发展。

依附论思想流派众多，但其基本观点、方法仍有相近之处，都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以发展问题为研究的主题，以全球南北关系为分析视角，都以中心、边缘、依附等概念为核心概念。依附论经历了从古典依附论到主流依附论，依附发展论的嬗变过程，其理论假设、观点又有差别，呈现不断修正的态势。依附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话语霸权，塑造了以发展中国家为视角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力图建构西方之外的发展新范式。

这种新范式的建立为中国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提供了一种视野。

从这种视野我们可以分析出，除了意识形态影响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外，地域研究方法论上的问题受到这种中心-边缘格局的影响。正如发展经济学中依附论形成后曾经盛极一时，被第三世界学者广泛接受，它标志着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以自己的立场探讨自己的发展问题。但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探讨还是摆脱不了处于边缘与中心对立的这种格局的干扰。并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这种影响会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

一、中心国家通过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掌握着国际金融、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并为经济全球化预设对其有利的规则现行国际游戏规则明显带有的偏袒性和不合

理性。

二、中心国家在文化领域把持着话语权，全球化条件下现代文化的传播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遵循着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论对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裁剪或切割，进而使其或多或少地打上了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加之边缘国家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使得自身学术建构的自主性在弱化中心国家凭借其拥有的制度优势、权力优势、技术优势和文化话语权使，边缘国家继续处于依附的地位依附论所描述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基本形态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所以我们在研究地域问题时要形成新的方法论必须先对现有体制进行一定的批判和改造。这就要求我们应积极参与、利用和改造现有国际秩序。全球化背景下，处于强势的中心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本质没有改变，中心——边缘的不平等结构继续维持，要维持、改革、推进这个已经使发展中国家有机会获得发展的国际体系，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由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受害者身份向基本受益者身份转化。中国与中心国家的关系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出现了更多的利益交汇点，这时发展中国家从现存国际体制外和反体制的力量转变为体制的参与者，中国才可能积极适应和利用现有国际规则为自身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可以比较明确的得以解决。

2007年11月29日